

周施廷 © 著

信仰与生活

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周施廷 ◎著

信仰与生活

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生活:16 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周施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301 - 25796 - 8

I. ①信… II. ①周… III. ①宗教改革—研究—德国—16 世纪 IV. ①K51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2458 号

- 书 名 信仰与生活: 16 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著作责任者 周施廷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796 - 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印刷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71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001	导言
003	事发之前的平静
006	同时代人的质疑
012	历史学者的解释
019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026	进一步寻找真相
032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纽伦堡
032	繁华的工商业和城市的分化
039	皇帝的城市和帝国的“首都”
042	资产阶级控制的城市
055	市政委员会的权力
062	和谐背后的冲突
065	改革不可避免
073	第二章 通往改革之路
074	路德的新教
081	纽伦堡的反应
090	纽伦堡的“路德小组”
093	知识精英们
111	新教在纽伦堡的传播

114	改革的吹鼓手们
117	纽伦堡的转向
122	第三章 修道院改革
123	纽伦堡的教会和圣佳兰修道院
134	路德对修道生活的看法
140	保守自救与圣佳兰修道院的命运
148	纽伦堡修道院改革的成功
155	第四章 社会救济制度改革
157	纽伦堡的救济制度
162	新教所带来的新动力
167	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
173	解决乞丐泛滥的问题
178	对纽伦堡改革的评价
181	第五章 彰显城市显贵利益的婚姻改革
182	路德的婚姻观
188	僧侣结婚和修女还俗
194	纽伦堡的婚事法庭
199	纽伦堡的婚姻法改革
205	市政府与新教僧侣的分歧
214	第六章 以新教的名义
215	政府权力的种种妙用
219	政府直接掌管经济
225	减少宗教节日和延长工时
234	匿名信与宗教宽容
243	政治宣传和官员培训

251	对激进民众运动的限制
263	结 论
270	附录一 《关于伟大的城市纽伦堡的政体和政府》
278	附录二 马丁·路德致纽伦堡印刷商的劝诫信
280	附录三 斯宾格勒写给约翰尼斯·布伦茨的信
283	附录四 《世俗政府是否有权在信仰问题上挥动宝剑》
288	附录五 德国城市的新教婚姻法和管辖权
289	附录六 纽伦堡新教宗教节日日历表
291	参 考 文 献

导 言

1525年3月3日至14日,德国帝国城市、帝国议会的所在地纽伦堡(Nürnberg)的市政委员会在市长大厅召开著名的“纽伦堡宗教会谈”(Nürnberger Religionsgespräch),^①旨在通过这次会议决定纽伦堡的信仰问题。这次会议始源于1524年的一个事件。复活节当天,数千名纽伦堡市民公开集会,他们批评僧侣,特别是多明我会(Dominicans)的修道士,还到处散发一些讽刺教皇和教皇使节的漫画。在市政委员会的会议上,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和他的同伴提议进一步推广路德教义。^②随后在1525年初,市政委员会的几位长老成为加尔都西修道院(Carthusian)的赞助者,来自这个修道院的僧侣开始声称有人在信仰异端,要求举行公开辩论。结果,在同年2月,市政委员会召集了城市里所有的僧侣,包括天主教和路德的信徒,要求他们列出基督教的要旨。

从这些僧侣递交的要旨中,市政委员会总结出12条议题,并且决定

① Günter Vogler, *Nürnberg, 1524—152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Reformator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tadt*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2), pp. 46—63; Georg Ludwig, *Die Politik Nürnbergs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n 1520—153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3), pp. 36—47.

② 奥西安德尔是路德忠实的支持者,毕业自英格尔斯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ät),于1520年来到纽伦堡,在1522年出任圣罗伦斯教堂驻堂神甫。他精通希伯来语,并撰写了多篇文章传播新教和路德的思想。1533年的《勃兰登堡—纽伦堡教堂规章》就是出自他的笔下。他还积极参与市政委员会的工作,在后来的新教司法改造中与市政委员会发生分歧。关于他的研究著作参见 Claus Bachmann, *Die Selbstherrlichkeit Gottes, Studien zur Theologie des Nürnberger Reformators Andreas Osiande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1996); Gunter Zimmermann, *Prediger der Freiheit, Andreas Osiander und der Nürnberger Rat 1522—1548* (Mannheim: Palatium-Verl. 1999)。

在3月就这些议题举行一场公开辩论,要求新教和天主教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代表们需要在所有纽伦堡的市政委员、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见证下进行论战,一般民众可以透过会议厅的窗户观看旁听。天主教的主代表是方济各神甫里恩哈德·埃尼尔(Lienhard Ebner),新教的代表是奥西安德尔。奥西安德尔在市政委员会里负责宗教事务,同时还是纽伦堡最重要的教堂圣罗伦斯教堂的驻堂神甫。由此可以看到市政委员会对新教阵营的偏向。由于得到市政委员会的支持,加上奥西安德尔渊博的神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辩论的情势明显倒向新教。

在六场辩论里,天主教阵营节节败退,至最后一天进行关键性的辩论演讲时,天主教神甫埃尼尔居然缺席辩论,奥西安德尔独自一人代表新教阵营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促使市政委员会尽快采取行动,解决纽伦堡的信仰问题,选择新教作为城市的唯一宗教。宗教会谈结束后,市政委员会正式决定接受新教教义,宣布纽伦堡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个新教城市。随后,市政委员会从班贝格主教(Bishop of Bamberg)手里取过纽伦堡所有宗教事务的管辖权,而支持宗教改革的修道院,如奥古斯丁修道院(Augustinians)^①、本督修道院(Benedictines)和加尔都西修道院也逐渐把财产交予市政委员会,逐步被市政委员会接受。^②一些拒绝改信新教的修道院如方济会(Franciscans),多明我会和圣衣修道院(Carmelites)则被勒令停止招收新的见习修道士,让它们自然“关闭”,同时自愿离开这些修道院的僧侣们将会获得市政委员会发放的一笔退休金。^③与此同时,纽伦堡的教堂发出公告,要求纽伦堡的传教士团结起

① 奥古斯丁修道院是纽伦堡第一所自愿关闭的修道院,他们在1524年12月13日去信市政府,要求关闭修道院。参见“13. Dezember 1524, Nürnberg, Nürnberger Ratsverlässe, Auszüge, Pfeiffer, S. 31, Nr. 225” in Ruth Kastner (Hrsg.), *Quellen zur Reformation 1517—1555*,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p. 320.

② Michael Truckenbrot,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Nürnberg* (Nürnberg: Im Verlag der Stiebnerischen Buchdruckerei, 1785—1786), pp. 411—412.

③ Harold J. Grimm, *Lazarus Spengler: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2—54.

来,传播新教福音。^① 市政府则发布法令,管治市内传教士的行为举止,要求他们必须行为端正。^②

纽伦堡宗教改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引起了连锁反应:大部分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都步纽伦堡的后尘,接受新教,转变成为新教城市。纽伦堡在最危急的时刻支援了路德,致使路德的宗教改革避免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纽伦堡宗教改革还直接鼓励农民革命,1525年的起义者视纽伦堡为战胜教皇和皇帝的英雄之城。由是,纽伦堡通过反抗教皇和皇帝的专横,重申了人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信念。在政治衰微、社会剧变的时候,纽伦堡的这场宗教改革无疑是一声春雷,预示着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高潮即将出现。

事发之前的平静

纽伦堡转向新教引起强烈震撼,不仅因为纽伦堡乃是帝国会议的所在地,相当于帝国的首都,而且还在于此事事前并无显著征兆、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突发事件。纽伦堡一向对德皇查理五世效忠,长久以来一直依靠德皇的庇护以维持城市边界和平与商业的稳定。纽伦堡在城市外围拥有大片土地,这些土地和林产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邻近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Margrave of Bran-

① Nürnberg, Geistliche, "Artikel, aus evangelischer Schrift gezogen, der sich die Prediger zu Nürnberg vereinigen sollen", in Hans-Jochim Köhler, *Bibliographie der Flugschriften des 16. Jahrhunderts, Teil I Das frühe 16. Jahrhundert (1501—1530), Band 3 Druckbeschreibungen M-S* (Tübingen: Bibliotheca Academica, 1996), 3509.

② Nürnberg, Rat, "Handlung eines ehrsamten, weisen Rats zu Nürnberg mit ihren Prädikanten", in Hans-Jochim Köhler, *Bibliographie der Flugschriften des 16. Jahrhunderts, Teil I Das frühe 16. Jahrhundert (1501—1530), Band 3 Druckbeschreibungen M-S*, 3511.

denburg-Ansbach)长久以来企图侵占这片土地,并曾多次发动战争。^①

当1524年1月14日帝国会议在纽伦堡召开时,^②一切显得十分平静。斐迪南大公起草了帝国摄政委员会(Reichsreigiment)关于议会的议事日程,高度评价重建帝国摄政委员会和帝国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的意义,并许诺为上述两个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然而,令包括斐迪南大公在内的所有纽伦堡人不曾料到的是,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一切。有个名为杰恩·哈纳特(Jean Hannart)的秘使从西班牙赶来,带来了皇帝密令,查理五世要求立即检查《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的执行状况,务必要彻底清除路德教义,务必不能让它任意传播。这封信激起轩然大波,人们尤其难忘查理五世密令中很不客气的措辞:“每个统治者务必使其臣民按照皇帝陛下的敕令行事。”^③

查理五世的倒行逆施行为迅速激化了矛盾,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愤怒了,帝国城市的反应尤其强烈。1523年3月中旬至4月19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I)派遣其驻德国的总代表枢机主教劳伦佐·卡佩基奥(Cardinal Campeggio)至城市议会,更是激起了人们心中怒火——因为正是此人,三番五次唆使查理五世下达密令,挑起了重申镇压路德的《沃尔姆斯敕令》的事端。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等倾向新教的帝国城市立即行动起来,在纽伦堡的代表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和斯特拉斯堡的代表汉斯·博克(Hans Bock)领导下,以自由城市和

①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C. Scott Dixon, *The Reformation and Rural Society: The Parishes of Brandenburg-Ansbach-Kulmbach, 1528—160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ton Schindling, *Die Territorien des Reichs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Konfessionalisierung, Land und Konfession 1500—1650, der Südosten* (Münster: Druckhaus Aschendorff, 1992).

② 1524年在纽伦堡举办的帝国会议有意识地对1523年的施佩耶尔城市议会进行回应,以期在信仰问题上取得和解。关于这两场会议请见 Armin Kohnle, *Reichstag und Reformation, Kaiserliche und ständische Religionspolitik von den Anfängen der Causa Lutheri bis zum Nürnberger Religionsfrieden* (Heidelberg: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1), pp. 204—227; Otto Reinhard Redlich, *Der Reichstag von Nürnberg 1522—23* (Leipzig: Gustav Fock, 1887); Arwed Richter, *Der Reichstag zu Nürnberg 1524* (Leipzig: Gustav Fock, 1888).

③ Thomas A. Brady, Jr., *Tu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pp. 167—168.

帝国城市的名义向大会提交抗议书,其文曰:

鉴于各地的普通人(The Common Man)对上帝之言和福音如饥似渴的倾慕、上帝之言和福音空前传播的状况,如果我们接受、赞同和允许对传播上帝之言设置哪怕是最轻微障碍的话,那么,光荣的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不仅不会执行这样的法令,而且毫无疑问地会导致大范围动荡、反叛、凶杀、血流成河,整体性毁灭和产生各种罪恶。……光荣的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这样的发展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危害、损害、毁灭,必须避免和保护这些城市及其人民遭受如此的灭顶之灾。^①

值得重视的是,这份抗议书中并没有提到城市究竟选择天主教或者新教为自己的信仰,却强调来自倾向于新教的普通人的压力——他们正在传播福音,倘若要限制他们,必然带来普通人的革命,随之就把所有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推向毁灭。斯宾格勒情绪激动,在帝国议会城市议院的会议上他这样说道:“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市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刻。如何令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基督将起来捍卫自己,因为我坚信:基督总是能够战胜他的仇敌的。正因为此,我们的力量无限。反之,尽管敌人看上去强大,他们的力量总是大不过上帝。”^②

然而,尽管纽伦堡对皇帝的态度有所抗议,却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纽伦堡居然会大张旗鼓地接纳新教,使自己直接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况且,这一发生在帝国会议所在地的事件,居然是由该市的市政委员会出面所导演,公开挑战帝国的最高权威,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大惑不解。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预料到在纽伦堡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这一事件自然引发了时人对纽伦堡当局动机的猜想,难道仅仅是皇帝的一封信

① Deutsche Reichstagsakten, jungere Reihe, 4:506—8, no. 113, here at 507, lines 27—37, and 508, line 1—6. Here quoted from Thomas A. Brady, Jr., *Tu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pp. 168—169, note 80.

② Thomas A. Brady, Jr.,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ommon Man,” in C. Scott Dixon, ed., *The German Reforma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9), p. 111.

密信,就足以让纽伦堡倒戈、与帝国为敌吗?此外,为什么是纽伦堡而不是其他城市呢?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的旁观者对此的第一反应都是惊讶。纽伦堡的巨变堪称是一个事件,为什么帝国城市纽伦堡会率先接纳新教成为一大谜团,不仅让同时代的人大惑不解,也让其后的历史学者百思不解,难以定论。

同时代人的质疑

按照常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帝国城市理应维持与信奉天主教的德国皇帝相同的立场。但是,纽伦堡却接纳了新教,公然挑战皇帝的权威,引起整个德国的震撼。纽伦堡的“越礼犯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首先,纽伦堡已经在帝国政府中获得重要位置,帝国珠宝和最珍贵的圣物都收藏在纽伦堡的圣灵救济院(Holy Spirit Hospital)内;帝国圣餐和帝国最高法院也都在纽伦堡举行。其二,纽伦堡市政委员会早已控制了该市两个教区的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通过一位代表与罗马教廷长期斡旋,市政委员会获得了对两个教区教堂神甫的任命权。^①其三,纽伦堡接纳新教是在市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去进行的,这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在其他城市,工匠们通过行会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城市的经济,他们参与和影响政治;但在纽伦堡,行会自1394年后就消失了,^②早就被排斥在市政委员会权力架构之外。在没有行会的组织下,工匠们无法与市政委员会抗衡,他们也难以发动暴动。既然如此,纽伦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纽伦堡已经奠定了如此地位,为什么还要一反常态,去进行与罗马教廷和德国皇帝抗衡的运动呢?

① Paul A. Russell, *Lay Theology in the Reformation, Popular Pamphleteers in Southwest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8—149.

② Gerald Strauss, “Protestant Dogma and City Government: The Case of Nuremberg,” *Past & Present*, no. 36 (Apr., 1967), p. 39.

同时代人对纽伦堡事件的第一个质疑是市政委员会是否具有领导宗教改革的合法性。纽伦堡改革最不寻常和最为著名的特点,是纽伦堡的世俗政府领导了这场改革。在16世纪的德国,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两把剑的理论:教皇掌管精神之剑、管理宗教和与道德有关的事务;君主或政府掌管世俗之剑,惩恶扬善,管理世俗世界。纽伦堡由市政当局领导宗教改革被同时代人视为一种僭越,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其中,最为响亮的声音,来自于纽伦堡的一位高层人士。1530年春天,这位重要市民撰写了《世俗政府是否有权在信仰问题上挥动宝剑》^①,对世俗政府掌管教会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尽管这篇文章匿名发表,但市政府秘书长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却心知肚明,知道撰文者来自改革派的阵营,并且还是他本人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此匿名作者认为:世俗政府无权干涉信仰自由,要求世俗之剑不再染指神圣的宗教领域。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引用《圣经·新约》:“在地上两个王国,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世俗的。精神王国是基督的王国,其中基督是国王。同样的,世俗王国里也有一位国王,他便是皇帝和其他的权威。就像每一个王国都拥有一位指定的国王,所以每位也有着独立的权杖、目标和尽头。精神世界的权杖是上帝的话语,其吸引我们的目标和尽头的是人转向上帝,从此他便得救了。另一方面,世俗王国的权杖是宝剑,宝剑所指向的目标和尽头是要驱使人们保持外部的和平。”^②言下之意,是世俗的政府只应当管理世俗事务,如果染指宗教事务的管辖,那就是超越了权限,有悖于《圣经》的教导。作者要求政府不得对宗教事务指手画脚,因为“基督并不是要世俗

① Anonymous, “Document Number Two: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in James M. Estes trans.,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A 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 freedom of worship and the Authority of 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Five Documents* (Toronto: CRRS, 1994), pp. 41—54.

② Anonymous, “Document Number Two: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in James M. Estes trans.,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A 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 freedom of worship and the Authority of 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Five Documents*, pp. 43—44.

政府的宝剑从她的王国中拔除任何东西,而是希望单凭着上帝的话语来战斗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先知以赛亚所声称的,基督会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而不是用世俗政府的宝剑。”^①可以看到上帝希望两个王国截然不同。基督留在他的王国里,即使他要比所有的皇帝和国王更加强大,他也是让世俗王国按照自己方式运作而不插手。所以,世俗政府只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王国,而不要尝试去介入管理基督王国的事情。

这个挑战影响巨大,纽伦堡的四位重要人物迅速对此做出回应。市政府秘书长斯宾格勒、新教传教士林克(Wenzeslas Linck)、圣罗伦斯教堂新教牧师奥西安德尔,以及新教改革家约翰尼斯·布伦茨(Johannes Brent)纷纷撰文,加以驳斥。其中,斯宾格勒特别愤怒,作为纽伦堡改革的策划者和实行者,他实在无法想象在实行家长式管理、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纽伦堡,竟会有人撰写匿名文章公然反对市政府的决策。

匿名作者对于纽伦堡政府的另一项指责是政府运用手中权力镇压不同信仰的人士。他指出:

群众参加一些秘密地方集会的教派活动,很明显并不是教派或者成员的错,而是政府的错,因为它无法包容这些教派。为什么世俗权威不能把信仰交给精神王国和它的国王基督呢?为什么要以信仰的正确与否而把人处以监禁,甚至处决和流放呢?否则,每个教派都会公开自由地宣讲她的信仰,而不需要秘密地进行。此后,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害怕公开宣讲他的信仰的理由,然而想要秘密进行的话,政府便有权禁止他的行为和告诉这个人:由于你不愿意公开宣讲你的信仰,让每个人去测试它是否真实,所以你必须停止这样的秘密行为,否则请离开城市。但是,无论是关于信仰的公开演讲还是教导都

① Anonymous, "Document Number Two: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in James M. Estes trans.,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A 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 freedom of worship and the Authority of 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Five Documents*, pp. 46—47.

被宝剑给禁止了,人们因此被迫把活动转为地下。结果,由于政府会迫害他们,这让邪恶的人对政府更加充满敌意,他们开始密谋一些计划来保证能够自由地教导教义,避免遭到迫害。所以可以说是政府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和促进了秘密的阴谋。^①

匿名作者反对政府运用权力处置与路德教不同信仰的人士,体现出政治问题应当与宗教问题两者区分的政治倾向。这些话,对于纽伦堡市政府当局来说如同芒刺在背,无法释怀。尤其重要的是,匿名作者并不是站在天主教会的立场上来反对市政当局的,相反,他引用的是《圣经》和路德“精神王国”“世俗王国”的理论,更使市政当局感到难以应付。由此可见,纽伦堡当局领导宗教改革及其一些具体的做法,在改革之时即遭遇质疑。好在纽伦堡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政策,这才避免了出现重大分裂、导致改革失败的不良后果。

同时代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改革能否也成为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争论。纽伦堡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克服中世纪晚期的宗教危机和社会危机,故而领域宽泛,涉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方方面面的调整,这也在当时参与改革的人士中间引发争论与非议。1525年后,市政府不仅收回了教会管理世俗事务的权力,而且全面管理宗教事务,并且把改革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经济、法律各个方面。在某些知识精英看来,这是政府滥用权力的做法。这种质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完全来自于天主教会的阵营,而主要来自于改革派内部,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更是这样。实际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小问题是市政府倡导的改革是否出于基督教的虔诚;大问题却涉及有无必要对改革的领域加以限制,即不得超越宗教的范畴,或者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去从事各项社会或经济的其他改革。

^① Anonymous, "Document Number Two: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in James M. Estes trans.,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A 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 freedom of worship and the Authority of 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Five Documents*, pp. 52—54.

纽伦堡改革是否符合宗教虔诚原理的问题是由纽伦堡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提出来的,^①他的背后,是一批对纽伦堡改革不甚满意的知识精英。路德的教义最初得到纽伦堡人文主义小组的接纳,皮克海默就是其中最热心和最核心的成员。路德首次在1518年到访纽伦堡的时候便是住在他的家中,^②而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在1525年11月来到纽伦堡视察新学校的时候,也是住在皮克海默的家中,^③可见他与这两位新教神学家的密切关系。皮克海默也因为与路德的密切来往,而被教皇在1520年6月15日开除路德出教的教谕中一并开除出教,与他一起被开除的还有纽伦堡的秘书长斯宾格勒。^④皮克海默在纽伦堡引进罗马法也有过贡献。^⑤可见,他是一位公正、虔诚、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和纽伦堡市政委员。

皮克海默对宗教改革态度的转变,可以说在1524年便已经开始。在1524年9月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显示,他有意与路德分道扬镳。他写道:“我是一个好的路德教信徒,我的朋友丢勒也是,我们希望罗马的流氓举动和僧侣,神甫的诈骗行为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事情反

① 关于皮克海默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介绍请见 Niklas Holzberg, *Willibald Pirckheimer: Griechischer Humanismus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81); Franz Fuchs, *Die Pirckheimer: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Wolfgang Schiel, “Willibald Pirckheimer, ein frühbürgerlicher Humanist” in Willibald Pirckheimer, *Der Schweizerkrieg: mit einer historisch-biographischen Studie* (Berlin: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8), pp. 221—262. 除此之外,皮克海默还与著名的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是青梅竹马的至交好友,两人有多封通信,收录在 Mary Margaret Heato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Albrecht Dürer or Nürnberg*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0).

② Harold J. Grimm, *Lazarus Spengler: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p. 35.

③ Helga Scheible, “Willibald Pirckheimers Persönlichkeit im Spiegel seines Briefwechsels am Beispiel seines Verhältnisses zum Klosterwesen”, in Franz Fuchs, *Die Pirckheimer: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ie*, p. 81.

④ 这次的教谕是埃克博士(Dr. John Eck of Ingolstadt)努力的结果。埃克认为此前出版的一份讽刺他的匿名作品是出自皮克海默的手笔,故此要对他进行报复。See Franz Fuchs, *Die Pirckheimer: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ie*, p. 76.

⑤ James M. Weiss, *Humanist Biography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Reformation Italy: Friendship and Rhetoric* (Surrey: Ashgate, 2010), p. 344.

而变得更糟了,在新教徒的反衬下,教皇派反而显得更加虔诚。”^①到了该年年底,纽伦堡反对新教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多明我修道院和方济各修道院,以及两所女修道院中。一些市民和贵族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皮克海默,他希望能重新回到旧信仰,并开始反对新教,他对宗教改革以及它带来的社会混乱感到失望。^②此前他还曾经在1518年批评过多明我会,说他们“对好的作品充满仇恨,努力要镇压甚至是清除所有的学者”^③。现在皮克海默反倒过来和他们站在一起。

令皮克海默真正感到不满的是:他不屑市政府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下为自己谋利益,即增进纽伦堡的权力和财富。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纽伦堡一直有着守财奴的名声,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事物是无法得到他们尊重的。皮克海默也同意这个观点,在1527年写给约翰·库斯皮尼安(Johann Cuspinian)的信中,他告诉库斯皮尼安,在纽伦堡,“金钱是我们的国王”^④。在自传中,他对市政委员的一些人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这个人进入市政府有阴谋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利益而来的”^⑤。有学者认为这个人指的是市政总理尼策尔,也有人认为是秘书长斯宾格勒。^⑥无论是哪一个人,皮克海默对市政府充满金钱的味道都很反感。1530年他甚至给约翰·切尔特(Johann Tschertte)写信说:“路德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不符,这些人并不比教皇派好多少:如果你听到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和神圣的福音说得那么好听,你就会以为它是纯金,会不断地闪耀,其实它

①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p. 172.

② Gottfried Seebass, “The Reformation in Nuremberg,” in Lawrence P. Buck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3—24.

③ 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

④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237.

⑤ 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 98.

⑥ Jackson Spielvogel 认为是斯宾格勒, Erika Rummel 认为是尼策尔。参见 Jackson Spielvogel, “Patricians in Dissension: A Case Study from Sixteenth-Century Nuremberg”, in Lawrence P. Buck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p. 86; 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 98.